

日印特別戰略夥伴關係： 新形態的戰略合作關係

林賢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摘要

本文檢視2005年以降日印兩國建構在外交、經濟、與防衛等領域合作的制度化過程，是否意味著將邁向同盟關係發展。日印兩國與中共之間分別存在著領土主權爭議，再加上中共積極擴大在印太區域的軍事存在，平衡中共威脅成爲日印發展戰略合作的重要動機。2014年9月，日印將兩國戰略合作關係提升爲「特別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勾勒出雙方戰略合作的路線圖，以共同發展印太區域的自由、開放、繁榮，以及確保印太海洋的交通線安全。不過，受限於國內共識與軍事實力不足，以及擔憂中共採取反制措施，短期內日印兩國不可能建構以中共爲對象的同盟。

關鍵詞：結盟、戰略夥伴關係、東進政策、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戰略、馬拉巴爾

* * *

壹、前言

2010年以降，中共在東海以及南海的獨斷舉動，被2012年12月再度組閣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視為威脅日本安全的外交安保危機。另一方面，印度曾於1962年與中共爆發國境戰爭，迄今雙方國境界線糾紛未解，中共崛起也讓印度感到不安。其次，中共海軍艦艇頻繁出現在印度洋海域，並且建構對印度形成包圍態勢的中繼港口，特別是在吉布地（Djibouti）建構首座海外基地，以及援建「中巴經濟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進入波斯灣的瓜達爾港（Gwadar Port），對印度構成戰略壓力。本文以為，由於日印兩國各自與中共之間存在領土爭議，憂慮中共企圖憑藉實力片面變更現狀，強化安全合作以「平衡」（balance）中共威脅，即成為日印兩國建構戰略夥伴關係的安全動機；另一方面，誠如印度首相辛哈（Manmohan Singh）於2006年12月14日在日本國會演說所言，經濟關係應該作為日印兩國關係的基礎（ユーチューブ 2006），日印兩國在經濟上的互補性，亦即，日本經濟實力與高科技發展，與印度龐大市場潛在力的相互吸引，成為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經濟動機。

後冷戰初期，印度提出「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尋求與亞太國家發展經貿關係，其後因印度於1998年實施核武試爆遭到日本制裁，導致日印關係陷入僵局。2000年8月，日本首相森喜朗赴印度訪問，與印度首相瓦杰帕伊（Atal B. Vajpayee）達成建構「全球夥伴關係」（Global Partnership）共識，打開日印關係的僵局（溜和敏 2017, 221-239）。2005年4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問印度，與辛哈首相達成兩國首相每年互訪的共識。在此機制下，辛哈於2006年12月訪問東京，與第一次擔任首相的安倍晉三為日印兩國發展全球性「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定調。2007年8月，安倍應邀以第一位日本首相在印度國會發表演說時強調：「日印兩國關係正是世界上蘊藏最具可能性的兩國關係」、「強大印度是日本的利益，強大日本是印度的利益」（外務省 2007）。翌年10月，辛哈在東京與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簽署「日印安全保障合作共同宣言」，讓印度成為繼美國、澳洲之後，與日本發表安全共同宣言的第三個國家。

2013年12月，安倍第二次內閣制定日本首部《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強調「開放與穩定的海洋」是日本繁榮與生存不可或缺的條件，特別是從印度洋連結西太平洋到日本、亦即所謂「印度太平洋」（Indo-Pacific Ocean, 以下簡稱：印太）的「海洋交通線」（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形同日本的生命線，因而將印度列為次於美國、韓國、澳洲、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以下簡稱：ASEAN）國家的戰略夥伴（內閣官房 2013）。該戰略公布前不久，安倍內閣安排天皇明仁赴印度進行史上第一次訪問，彰顯日本重視日印關係。同樣地，印度為彰顯印日關係的重要性，也首度邀請安倍作為2014年1月共和國紀念日閱兵典禮主賓。同年5月就任的印度首相莫迪（Narendra Modi），以日本作為出訪南亞區域外國家的首站，突出日本在其「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的優先地位。其後，安倍提出「自由開放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戰略，企圖建構「免於武力脅迫，重視自由、法治、市場經濟與繁榮」的印太區域。另一方面，莫迪政府則著手強化與日本、ASEAN等亞太國家的合作關係，也尋求與日本印太戰略對接，因而促成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再強化。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日印兩國強化戰略合作的「結盟」（alignment）過程，以及雙方確保能源供應安全、穩定的印太區域權力平衡等共同戰略目標，並且檢視日印兩國在經濟、政治外交、安全與防衛等領域進行戰略合作的制度化發展。本文認為，中共崛起導致印太區域權力結構失衡，對日印兩國利益造成威脅，是日印兩國尋求在印太區域結盟——發展「戰略夥伴關係」¹——以平衡中共的安全動機。同時，擁有高尖端產業科技、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是提供印度最大規模「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以下簡稱：ODA）的國家，足以協助印度發展經濟的相對強大夥伴，而印度龐大人口的潛在市場，則是日本推動經濟再生的動力源，緊密化日印經濟關係，即成為強化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經濟動機。

¹ 從2005年小泉純一郎內閣賦予日印「全球夥伴關係」的戰略性方向，一直到2014年安倍內閣的「特別戰略全球夥伴關係」，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名稱，因關係強化而迭有變化，參閱：林賢參（2018）。本文一律以「戰略夥伴關係」概念涵蓋之。

有鑒於此，本文透過相關文獻的彙整，對前述假設命題進行驗證。在驗證過程中，本文將從「結盟」的概念，闡述近年來日印兩國除了強化經濟合作關係之外，也逐步強化安全與戰略對話的層級與範圍、實施聯合軍事演習、以及軍事技術與裝備移轉在內的戰略夥伴關係，強調其迥異於以特定對象為假想敵的「同盟」（alliance），係後冷戰時期逐漸發展出來的國家間戰略合作「範例」（paradigm）。以下第二節，彙整知名同盟政治研究學者史奈德（Glenn H. Snyder）等人的文獻，對於結盟、戰略夥伴關係與同盟的定義進行區隔，作為解構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概念性分析架構；第三節將探討日印兩國各自對外結盟的歷史經驗，以及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形成；第四節則是闡述日印兩國由經濟夥伴關係提升至特別戰略夥伴關係，並且將經濟與安全戰略合作相連結的內涵，探討兩國強化具有國防意涵的經濟合作，以及深化安全戰略合作廣度與深度的意圖；最後的結論，驗證日印兩國締結戰略夥伴關係的經濟與安全動機，以及兩國邁同盟或「準同盟」（quasi-alliance）的制約因素。

貳、文獻回顧與界定「戰略夥伴關係」

在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為確保生存與繁榮的目標，可採取動員國內資源以強化權力的「內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以及當自身權力不足時，與外國合縱連橫的「外部平衡」（external balancing）措施，以平衡潛在對手的威脅或相對權力。與感受到相同威脅來源的國家締結正式或非正式同盟以平衡威脅，即是外部平衡的主要手段（王義桅、唐小松、潘崇易、張登及2014, 210-211）。因此，尋求與外國的結盟，包括締結同盟條約、或其他安全合作模式或形態，即成為國家在國際體系重要的互動模式。以下將透過文獻回顧，釐清本文分析概念「戰略夥伴關係」的定義及其特性。

一、「戰略夥伴關係」不等同於同盟

「戰略夥伴關係」與「同盟」一樣，屬於結盟模式的一種類型，但是，兩者的性質不同。現實主義者認為，同盟是判斷戰爭有潛在可能的國家，為了嚇阻戰爭的爆發，或者是自認無法單獨對應戰爭時，尋求與其他國家達成共

同防衛、嚇阻戰爭爆發及其危機管理的約定，包括正式條約或「心照不宣」（tacit）的約定。「同盟形成」（alliance formation）的基本要件，在於國家間共有的利害關係，一旦利害關係消失，同盟將失去存在基礎。國際政治學界對於同盟的定義，雖然莫衷一是，但是，普遍認為締結同盟的主要目的，在於共同防止威脅、確保安全或利益（土山實男 2004, 299-303）。因此，同盟關係特別置重點於安全確保，準備軍事力量共同防衛來自特定第三國的敵對威脅。

誠如史奈德（Snyder 1990, 110-111）所言，同盟是要付出代價，亦即，冒著被同盟捲入戰爭的風險（risk）或限縮本國的戰略選項，甚至因而加深對手的敵意，並誘發對手建構敵對同盟。例如，擔心中共可能強化與巴基斯坦的同盟或準同盟關係，成為制約印度與日本結盟的因素之一。史奈德較早期的研究指出，國家在締結同盟時，可能會面臨兩種類型的「同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亦即，對同盟過度承諾，擔心被同盟國「捲入」（entrapment）與本國利益無關聯戰爭的困境；承諾過於薄弱，以搭便車心態而不願意「分攤責任或風險」（burden-sharing），當國家面臨威脅時，可能遭到盟國不履行承諾的「背棄」（abandonment）困境（Snyder 1984, 461-495），而這就是包括印度在內的許多國家不願意締結同盟條約的原因。

沃爾特（Stephen M. Walt）將「同盟」廣泛定義為「兩個或更多主權國家之間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arrangement）」，俾便「確定在國際事務中促使國家相互支持的廣泛力量」，並強調：刻意區分同盟與結盟的定義，可能導致誤解，因而將非正式或準同盟關係包含在結盟之內（Walt 1990, 12）。不過，史奈德（Snyder 2007, 4, 7-8）認為，「同盟是國家所建構為行使（或不行使）軍事力量的正式組織，在特定情況下，對抗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因此，同盟只能是某種形式的正式協定結果，其定義迥異於沒有協定或條約束縛的結盟。史奈德強調，正式同盟只是創造或強化結盟的手段，同盟是結盟的分支，不同的是，同盟是建立在付隨著具體性要素、法律上與道德上的義務、互惠的明文協定或條約，結盟則不負擔相互防衛的義務。史奈德（Snyder 1990, 104-106）早期的研究指出，「結盟是一種複數國家之間的相互期待，當成員國與其他特定國家發生紛爭或戰爭時，能夠彼此相互支援，這種期待主要來自於共同的利益或敵人，並且會隨著國家利益、國內政治結構、

他國行為認知的改變而變化—增強、減弱、或消失」。其次，瓦德（Michael D. Ward）也認為，結盟是透過各種行動、而不是正式條約展現出來，比同盟具有更廣泛的概念，原因在於它不像後者僅只是聚焦於國際政治的軍事領域（Wilkins 2012, 56、58）。

梅農（Rajan Menon）甚至預測，後冷戰時代美國在西歐與亞洲的同盟網絡逐漸產生質變，類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NATO）、美日與美韓等同盟形態終將結束，由在特定議題或挑戰當中與美國具有共同利益的結盟取而代之，19世紀英國首相帕麥斯頓（Lord Palmerston）所謂國家「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格言，將再次獲得驗證（Menon 2003, 1-20）。誠如卡納（Parag Khanna）所言，我們現在是「處於結盟、而不是同盟的世界」，而戰略夥伴關係即是結盟的一種新形態（Wilkins 2012, 54、58）。事實上，冷戰結束以降，締結同盟條約日益顯得過時，而摸索新型國家間緊密合作關係的結盟，特別是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的動態，則成為國際社會矚目的焦點，也是日印兩國對外結盟的重要行為模式。

二、「戰略夥伴關係」的特性

誠如伍德曼（Stewart Woodman）所言，1990年代以降，國際社會的結盟形態已經由建立在軍事力量的正式同盟，轉向基於特定議題的「暫時性權宜措施」（transient marriages of convenience）。威爾金斯（Thomas S. Wilkins）認為，不同形態結盟的出現與發展，例如，「志同道合者聯合」（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以及戰略夥伴關係，並未依循傳統的軍事同盟範例（Wilkins 2012, 54）。美國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於2001年，集結同盟友好國家組成「志同道合者聯合」，對伊拉克發動攻擊的反恐戰爭，即是一種非正式、暫時性的結盟範例。至於安全共同體，例如，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已經是個全面發展的安全共同體，而ASEAN則是初期發展的安全共同體。

白石昌也（2014, 2）表示，戰略夥伴關係的合作強度遠不如同盟，只是比一般友好國家間關係還要緊密，在高度互信的基礎上，建構彼此在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領域進行長期的相互補強、對等的合作與交流關係。換言

之，戰略夥伴關係是一種兩國之間基於對等、平等、尊重、互惠的立場，長期間共同合作以發展互利共榮關係，雙方或許存在著共同的威脅來源，但是，它不是用以對抗威脅為目標，迥異於提供防衛承諾的同盟。威爾金斯（Wilkins 2012, 67-68）認為，戰略夥伴關係是新形態的結盟，廣泛使用於俄羅斯與其他大國關係，反映出當代國際關係的轉型，雖然學界對其定義並無共識，但是，不能將其視為同盟或聯合的同義字。威爾金斯強調，基於國家間的結構性合作以獲取經濟機會的益處或有效因應威脅，遠勝於國家孤立行動的考量，國家選擇與他國建構戰略夥伴關係，除了共享情報、技術、資源之外，也共同分攤責任或風險。同時，威爾金斯列舉戰略夥伴關係的特性如下：

第一，組成目的是普遍性的，不著眼於嚇阻或打擊敵對國家等特別任務，並且主要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

第二，主要是「目標驅動」（goal-driven），而不是「威脅驅動」（threat-driven），雖然彼此有關切的安全議題，但是，並不將特定國家視為共同的威脅。

第三，趨向非正式的，承擔低成本的承諾，行動不受到同盟條約的束縛，保留較大程度的自主性與彈性，從而減輕同盟的捲入困境。不過，並不排除雙方針對特別議題發表共同聲明與「建立信任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第四，經濟交流在合作領域中顯得很重要，是夥伴關係的主要驅動力之一，但是，其中也包含更多的傳統安全問題，反映出經濟在當代國際舞臺上，與軍事力量同等重要的情況。

因此，威爾金斯（Wilkins 2011, 123-124）認為，戰略夥伴關係是很好的結盟形態，不但可以因應威脅，也不至於激怒大國，甚至還可以保持「避險」（hedge）能力，渠引述高德斯坦（Avery Goldstein）研究指出，戰略夥伴關係的基本構成要素，包括承諾提升穩定的關係與廣泛的經濟交流、消除國內政治分歧俾便共同致力於國際外交上的共同關心議題，以及常態性頻繁的官方互訪，特別是軍方代表以及政府高層的定期峰會。

納德卡尼（Vidya Nadkarni）指出，戰略夥伴關係已經成為許多主要國家之間部署彼此關係，因應後冷戰時期亞洲安全情勢的首選工具（Nadkarni

2010, 44)。俄羅斯總統葉爾辛 (Boris Yeltsin) 於1996年4月, 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共同聲明, 將兩國關係定位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此架構下, 中俄戰略合作持續升溫。2001年簽署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規定, 雙方的「軍事和軍技合作不針對第三國」, 即使「出現締約一方認為會威脅和平、破壞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針對締約一方的侵略威脅的情況」, 但是, 僅止於「立即進行接觸與磋商」, 排除共同對應第三國威脅的同盟內涵。2011年, 中俄關係升級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雙方持續謀求經貿與科技合作的互補互利, 除了首腦定期互訪之外, 也建構外交、軍事、戰略安全、情報等高級別對話機制, 共同主導「上海合作組織」以及海上聯合軍演, 逐漸充實戰略夥伴關係的內涵 (李靜杰 2002, 97-114)。納德卡尼 (Nadkarni 2010, 52-80) 認為, 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植基於共同反對美國與 NATO 的聯合戰線, 其核心在於牽制美國、雙方互利互惠的軍售與經貿關係、以及逐漸升級的安全戰略合作。由此可知, 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具有經濟合作、高層互訪、戰略對話與軍事交流 (演訓) 等制度化措施、不提供相互防衛承諾等特性, 讓中俄戰略合作成為探討戰略夥伴關係的範例。

參、日印兩國對外結盟經驗

在釐清戰略夥伴關係概念之後, 以下將彙整近現代日本、印度各自的對外結盟經驗, 並且檢討日印結盟關係的相關文獻, 做為分析現階段日印戰略夥伴關係及其今後可能發展的基礎。

一、日本對外結盟行為模式

近代日本外交史上, 對日本具有關鍵性影響的結盟經驗, 可以做為探討當代日本對外結盟行為的參考。例如, 第一次與第二次的日英同盟 (1902、1905)、德義日三國同盟 (1940)、或者是戰後兩次的美日同盟 (1951、1960), 具有為平衡帝政俄羅斯/蘇聯的威脅, 同時也具有與強者結盟以擴大利益的「獲利型扈從」(bandwagon for profit)、甚至是趁機攫取利益的「豺狼型扈從」(Jackal bandwagoning) (土山實男 2004, 307; Schweller 1994, 72-

107)。其次，川崎剛（2008, 115-128）認為，第一與二次日英同盟、第一次美日同盟，既是日本扈從於強者的形態，同時也具有平衡威脅與擴大利益的雙重目的，而第二次美日同盟則無法確認；另外，第三次日英同盟（1911）則是不具備共同威脅，而是單純的擴大利益型同盟；至於日本與德義兩國締結成爲三國軸心，乃是平衡威脅型同盟。本文認為，戰後日本與美國締結安保條約，乃是典型的「獲利型扈從」，除了是利用美國以平衡蘇聯威脅之外，也包含利用美國援助以發展經濟，並藉此提升日本國際地位的雙重動機。

後冷戰時期，蘇聯威脅由北韓開發核武以及中共崛起的威脅所取代，面對此等威脅，日本除了增強自衛隊戰力等內部平衡措施之外，也推動與美國等同盟友友好國家合縱連橫的外部平衡作爲，特別是安倍內閣以推動「戰略外交」爲名，與具有戰略重要性國家發展戰略夥伴關係成爲主流。白石昌也（2014, 5）於2012年12月8日，以「戰略夥伴關係」關鍵字在外務省官網搜尋到637件，而本文於2021年2月15日也以同樣關鍵字搜尋，則出現9,030件。其中，除了印度之外，日本已經與澳洲、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寮國、柬埔寨、蒙古、英國、法國、俄羅斯、巴西等超過20個國家、歐盟與ASEAN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成爲日本外交的新形態。其中，日本與澳洲的戰略夥伴關係，² 乃是討論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對照組。1997年4月，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訪問澳洲，與澳洲總理霍華德（John W. Howard）達成日澳首腦每年互訪的共識，奠定日澳戰略夥伴關係的基礎。其後，在日澳兩國共有民主價值觀、確保亞太區域穩定與海洋交通線安全的共同利益、緊密的經濟合作關係等基礎上，隨著與雙方共同的同盟國美國強化防衛合作，日澳戰略夥伴關係亦隨之強化。

2006年3月，日澳兩國外長在澳洲發表「邁向建構全面性戰略夥伴關係」共同聲明，並且與美國舉行首次三國外長戰略對話（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其後，在安倍第一次內閣任內（2006/9~2007/9），日澳兩國發表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及其行動計劃，並且召開首次「外交與國防部長聯席會議」（泛稱「2+2會議」），開啓日本與美國以外國家進行安全合作的歷史性

² 有關日澳戰略夥伴關係的事例研究，參閱：Wilkins（2011, 127-135）。

一頁（外務省 2019a）。在此基礎上，日澳兩國陸續簽署部隊相互提供後勤支援的《物品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ing Agreement, 以下簡稱：ACSA）³（2010年）、情報交換的《情報保護協定》（Information Security Agreement）（2012年）、軍售與技術移轉的《防衛裝備品與技術移轉協定》（Transfer of Defenc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2014年）。2018年10月10日，在澳洲舉行的日澳「2+2會議」發表共同聲明，再度確認兩國「特別戰略夥伴關係」，以及期待早日完成締結《訪問部隊地位協定》（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⁴ 交涉、⁴ 決定自2019年起開始實施戰鬥機共同訓練（日本經濟新聞 2018a）。基於日澳兩國戰略合作關係的急速發展，日本國內將澳洲視為準同盟國的看法已經定型（佐竹知彥 2019；Garnaut 2014）。

阿久津博康（2010, 423-454）將日澳、日印、日韓、韓澳等四組雙邊安全合作視為「準同盟合作」模式，該模式植基於共通的「背棄恐懼」、「威脅」、「利益」、「價值觀」基礎上，以及透過彼此間「制度化的政治與行政連結」等五項因素所形成。具體而言，由於對美國承諾的不安，美國亞洲盟邦彼此間雖然沒有同盟條約，卻逐漸建構出雙邊安全合作關係，以緩解對美國承諾之不安，此等雙邊合作即是準同盟關係。阿久津認為，日印兩國只有在威脅、利益、價值觀等三項因素具有堅強基礎，如果兩國要發展準同盟關係，就必須加強在「制度化的政治與行政連結」項目。不過，阿久津的準同盟論，並未包括同盟重要構成因素：安全承諾。從相互防衛的觀點來看，受限於憲法第九條規定的日本，無法提供對外國的安全承諾。2015年9月，日本國會通過《和平安全法制》，授權日本政府可以派兵協防與日本安全具有唇齒相依關係的國家，此舉雖然擴大日本與外國發展準同盟關係的想像空間。但是，該法案

³ ACSA係規範締約國軍隊間相互提供食物、燃料、彈藥、運輸、醫療等後勤支援的條約，日本迄今已經與美國、英國、澳洲、法國、加拿大等五國締結。日印ACSA原預定於2019年12月舉行的日印峰會時達成最終共識，因峰會延期而未實現。其後，受到新冠病毒（COVID-19）全球大流行影響，改由日本駐印度大使鈴木哲與印度國防部次長庫瑪（Ajay Kumar）於2020年9月9日在印度德里簽署。外務省（2020a）。

⁴ 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COVID-19疫情期間的2020年11月17日訪問東京，與日相菅義偉達成規範日澳兩國部隊進入對方境內的法律框架《相互准入協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內容架構共識，嗣後再由外交與法務部門協議詳細內容。

在審議期間引發憲法學界一面倒地批判違憲，以及大規模群眾走上街頭抗議，主要媒體民調也是反對遠高於支持，再加上該法案附帶決議規定，計畫派兵到海外協防他國時，必須毫無例外地獲得國會的「事先承認」，勢必降低日本對外承諾的可信度。

二、印度不結盟傳統與戰略夥伴關係外交

自1947年獨立建國以降，印度在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倡導下，堅持不加入美蘇陣營的不結盟運動，被視為印度外交傳統。當時印度不結盟的內涵，包括不參加軍事同盟、堅持獨立自主外交，並且反映在與美蘇兩國以外的不結盟國家維持合作關係（堀本武功 2006, 36-47）。但是，為平衡中共與巴基斯坦結盟的威脅，印度於1971年8月與蘇聯締結具有同盟意涵的《印蘇和平友好合作條約》，偏離不結盟路線。以此為契機，蘇聯不但成為印度的武器供應國，也是印度外交的重要夥伴。其後，由於美中關係正常化與印美關係惡化，形成美中巴三國與印蘇兩國的冷戰對立結構（堀本武功 2012, 37-68；2006）。誠如莫漢（C. Raja Mohan）所言，當國家利益需要時，印度與蘇聯簽署具有同盟特徵的條約，甚至於2005年分別與中共、日本發展戰略夥伴關係，以增加印度的戰略選項（Mohan 2006, 17-32）。

拉賈戈帕蘭（Rajesh Rajagopalan 2017）指出，對印度而言，沒有相對良好的安全環境，是難以追求不結盟的政策選項。拉賈戈帕蘭強調，由於中印兩國存在著地緣鄰近性、國力巨大差距、以及領土爭端等因素，再加上中巴兩國緊密的戰略合作關係，單靠印度自身力量是不足以平衡威脅，此一狀況不但限制印度不結盟的可能性，也迫使印度必須與有助於印度平衡中共、協助其提升能力的相對強大夥伴結盟（Rajagopalan 2017）。誠如伊豆山真理（2020）所言，印度與美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目的，在於獲得美國承認印度的國際地位、特別是核武國家地位，以及美國援助印度強化在既有國際秩序上善盡責任的能力。

後冷戰初期，印度採取全方位外交，對於重要兩國關係賦予戰略夥伴的定位。喬杜利（Rudra Chaudhuri 2009）認為，戰略夥伴關係是「目標驅動」的合作形態，不同於同盟的「威脅驅動」，是建立在確保夥伴國家實現共同利

益的基礎上，前述印蘇條約是印度首次的戰略夥伴關係，就如同印度於2009年與美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一樣，都不影響印度的主權性決定（Chaudhuri 2009）。莫漢（Mohan 2006）甚至認為，雖然美國與印度簽署民用核能合作協定，以及涵蓋情報合作、聯合軍演與軍售的《國防關係新框架》（New Framework for Defense Relationship）協議，但是，印度基於自身安全利益優先以及不屈就為「從屬夥伴」（subsidiary partner）的考量，不可能與美國締結正式同盟。自1997年以降，印度陸續與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巴西、東望政策對象國、西歐國家、以及重要產油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從印度立場來看，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資金、技術、市場，是印度發展經濟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時發展與中俄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不但可以迴避對任何一方的過度依賴，也可以作為交互牽制的籌碼。

2011年11月，印度「國家安全研究基金會」（Foundation for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發表報告指出，戰略夥伴關係是21世紀新形態國際關係，有別於冷戰期間相互對抗的同盟，夥伴國家會進行國防裝備與技術移轉、軍事演習、核能合作、貿易投資、關鍵議題的外交支持，以及科技、教育、資訊與傳播技術、金融等領域的合作，合作領域或程度則依夥伴國不同而有所差異。該報告從政治外交、經濟、國防等三個領域，評估印度締結戰略夥伴關係的俄羅斯、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六國與印度關係的評比。其中，由於日本在國防合作項目得分為零，在政治外交合作得分也不高，因而名列最後。不過，誠如報告結論所言，日印關係正處於起飛階段，經濟合作潛力顯而易見，再假以時日發展國防合作，並且致力於與印度所關切政治外交議題的合作，日印關係可望大幅提升（Kumar et al. 2011）。研究團隊成員之一的前印度外交部長席保（Kanwal Sibal）指出，與所有國家保持友好關係，並且在可能的領域建立友誼的夥伴關係，符合印度的利益；戰略夥伴關係是印度外交的「宣示性」（declaratory）術語，其目的在強調深化雙邊長期的戰略合作關係，以及促進在共同利益上的政策趨同，此等關係可以淡化不結盟傳統，並且輔以「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概念，讓印度外交政策選項更具有彈性與獨立性（Sibal 2012）。

席保所指的「戰略自主」，成為印度政府支援的研究團隊於2012年2月公

布「不結盟2.0」(Nonalignment 2.0)報告的關鍵術語。該報告指出，國力漸增的印度應該比以往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實際上印度也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期待。不過，研究團隊認為，印度國力與國際社會的期待存在巨大差距，建議以「戰略自主」作為今後外交國防政策的基石，並強調印度雖然不排除與特定國家建構緊密的合作關係，卻必須確保攸關印度國家利益議題的自主決定，不介入與印度利益無關的紛爭。其次，研究團隊認知到中印國力的差距，再加上美國對中政策的不確定性，主張印度必須維持彈性的政策選項，不應與特定國家結盟或選邊站(Khilnani et al. 2012)。誠如坎貝爾(Kurt Campbell)所言，「印度有著難以置信的獨立外交政策，也許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是如此」，希望與印度結盟以對抗中共是不切實際的想法(美國之音 2017)。堀本武功(2009, 24-31)也認為，印度如同是「亞洲的法國」，雖然與歐美共有利害關係，卻是以自有的「稜鏡」(prism)與國家利益來看待世界，質疑印度與他國締結同盟的可能性。不過，誠如拉賈戈帕蘭(Rajagopalan 2017)所言，當國家面臨嚴重威脅時，結盟反而可以提升戰略自主，不結盟反而會傷害印度的戰略自主。

三、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形成

威爾金斯(Wilkins 2011, 116、136)認為，面對後冷戰時期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以及國內政經制約因素，日本採取雙軌安全防衛政策，除了持續強化美日同盟關係之外，也積極創造新型雙邊合作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打造與澳洲、印度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以增加對外政策的「可操作性」(maneuverability)。日印兩國經濟具有高度互補性，日本擁有豐沛的資金與高度技術，印度擁有龐大的勞動力與市場，增強雙方結盟的動機。其次，蘇里(Anirudh Suri)強調，對日本而言，與印度建立更好關係有助於日本重建在亞洲領導地位；對印度而言，與日本建構戰略夥伴關係將增加印度融入亞洲的可能性(Suri 2007)。2005年4月，日相小泉與印度首相辛哈共同提出發展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八項戰略方針(外務省 2005)，讓日印戰略夥伴關係進入形成階段。在此階段，日印兩國基於共同的經濟與安全利益、價值觀或意識形態，摸索共同因應國際環境不確定性風險的戰略合作可能性，在確認雙方具有

高度戰略契合度後，即著手擬訂緊密化戰略夥伴關係的路線圖。

2006年9月成立的第一次安倍內閣，提出將歐亞大陸塊外緣建構成爲「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構想，以及由美國、日本、印度、澳洲參與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機制，積極發展與印度的戰略合作關係，以確保亞洲區域權力平衡。翌年8月，安倍在印度國會演講中表示，日印兩國人民間的相互親近感，⁵ 包含著對深化經濟關係的高度期待，呼籲雙方合作建構「自由與繁榮之弧」。安倍指出，印太海洋交通線是最重要的經濟運輸大動脈，日印兩國應該與美國、澳洲、以及其他志同道合國家聯手確保其安全。其後，安倍與辛哈發表聲明，勾勒出透過經貿交流與安全合作的兩條途徑以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的路線圖，包括強化「政治、安全、防衛等領域的對話與交流合作」、「全面性經濟夥伴關係」、「締結高科技領域合作協定或備忘錄」、「民間、學術、文化的交流」、「區域與全球性議題的合作」、以及「定期召開經濟戰略會議」等項目（外務省 2007）。

美國國防大學智庫報告指出，現階段印度雖然只是一隻小象，但是，其體積龐大又處於發展期，擁有廣闊且存在主權爭議的中印國境邊界，足以牽制北京的地緣戰略價值，是今後日本安全的最大資產（Lynch III and Przystup 2017, 25）。莫漢（Mohan 2007）認爲，由於美日兩國注意到印度崛起的戰略意涵，因而迅速加強與印度合作，安倍在印度國會的演說中，即透露出日本拉攏印度的意圖。莫漢強調，日印兩國基於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經濟與技術的互補性、對於中共崛起的共同關切、維持亞洲區域權力平衡的共同承諾，日印戰略夥伴關係將讓亞洲地緣政治產生不可逆轉的變化。其次，拉賈戈帕蘭（Rajagopalan 2017）強調，印度希望與強而有力的夥伴在亞洲建構區域結盟以平衡中共威脅，在避免被利用爲大國競逐的馬前卒考量下，日本是唯一與印度力量相匹配的結盟對象。前印度駐日大使奇諾伊（Sujan R. Chinoy）指出，中共崛起衍生國際體系權力失衡的不確定性，根本改變日印兩國的經濟與

⁵ 日本外務省在印度實施民調顯示，76%認爲日印關係「非常好」或「良好」，79%認爲日本對印度經濟發展有幫助，94%歡迎日本企業赴印度投資，92%認爲日本是足以信賴的友邦。外務省（2009b）。

戰略關係，讓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意義更為深遠（Chinoy 2020, x-xii）。巴貝伊（Kanti Bajpai）也指出，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發展的驅動力，除了經濟利益因素之外，主要是中共崛起、美國的不確定性以及緊縮對亞洲盟邦承諾的可能性等戰略趨動因素。巴貝伊期待日本協助印度提升經濟與技術能力，俾便與ASEAN、澳洲等國合作建構抗衡中共在海洋亞洲影響力的「聯合」（Bajpai 2019）。兩位印度裔學者甚至認為，日印戰略夥伴關係乃是因應美國無力維持亞洲權力平衡的避險措施（Joshi and Pant 2015, 312-329）。總而言之，中共崛起導致區域權力結構的失衡，驅動日印兩國緊密化戰略夥伴關係，幾乎是日印關係研究學界的共同觀點。

莫漢（Mohan 2006）指出，雖然日印雙方並不希望將兩國關係奠基於對應中共威脅的同盟，但是，雙方都知道深化兩國戰略夥伴關係可開啓新的戰略選項，並且降低中共崛起的負面衝擊。其次，日印兩國沒有戰略利益衝突，具有共同的民主價值觀、追求確保亞洲和平與穩定的制度化秩序，以及制衡中共稱霸野心的共同戰略目標，可謂是亞洲的「天然同盟」（Paul 2012, 31-50）。此外，有研究認為，美日同盟是印度首相莫迪推動東進政策的重要支柱，再加上日本制定《和平安全法制》，開啓與印度擴大防衛合作的新途徑，暗示日印同盟的可能性（Singh and Yamamoto 2016, 111-123）。長尾賢（2017a）甚至主張，持續強化的日印戰略夥伴關係已達到同盟階段。不過，對照前述同盟定義，日印同盟顯然尚未達標，菊池努甚至認為是一廂情願的看法。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兩位學者認為，面對印度不結盟的傳統，以及日本民衆強烈反對《和平安全法制》，日印兩國不可能形成正式同盟（Hussain and Tan, 2019）。穆克吉（Rohn Mukherjee）也認為，日印戰略夥伴關係提升為同盟，將面對許多重大障礙，例如，印度堅持戰略自主、雙方限制安全承諾的動機、同盟間的「推卸責任」（buck-passing）與「捲入困境」、中共採取經濟報復的強度等因素（Mukherjee 2018, 835-859）。

⁶ 作者訪談，日本青山學院大學教授菊池努，日本東京，2019年7月16日。

肆、充實戰略夥伴關係的合作基礎與制度化

日相安倍不顧國內反核輿論，與印度簽署《核能和平使用合作協定》，除了著眼於出口核電設施與技術的經濟因素考量之外，也具有協助印度增強國力以平衡中共的戰略考量。特別是美中權力消長之際，對於美國安全承諾的不安，導致日本尋求補強美日同盟的結盟，印度當然成為結盟的對象（Basu 2016, 41-64；堀本武功 2015）。其次，日本著眼於印度的龐大市場，而印度則著眼於日本的先進產業科技與資金，也是促成日印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的動機（Chand, Garcia, and Modlin 2018, 48）。此外，印度首相莫迪提出東進政策，選擇日本作為出訪南亞區域外國家首站，與日相安倍發表將日印關係提升為「特別戰略全球夥伴關係」（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的共同聲明，表明雙方將定期實施外交、國防、財政、經貿、能源等多領域部長級對話與合作。綜合前述可知，經濟與安全層面的合作，乃是架構戰略夥伴關係的骨幹，本節將彙整近年來日印兩國充實這兩根骨幹的制度化發展，以及雙方在印太區域合作的現況，呈現安倍與莫迪合作建構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內涵。

一、經貿投資與技術交流等經濟層面合作

後冷戰初期，印度首相拉奧（Narasimha Rao）採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並且提出東望政策，以期搭上亞太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的順風車（堀本武功 2006）。拉奧於1992年6月訪問東京，期待引進日本資金與技術。以此為契機，日本對印度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以下簡稱：FDI）飛躍成長，從1990年1,400萬美元暴增為1997年4.34億，雖然不如同期日本對中共投資的5.79億、19.87億，日本提供印度ODA金額卻是扶搖直上，最高達到佔日本對外ODA的40.5%，為日本企業投資印度鋪路。不過，由於印度存在交通與電力等基礎設施不完備、複雜的稅制、以及勞動法等結構性投資瓶頸，讓日本企業裹足不前，再加上日本因印度實施核試爆而採取停供ODA等制裁措施，導致兩國政經關係陷入僵局（マドオチャンダ・ゴーシュ 2017, 61-80）。其後，日本恢復對印度提供ODA，再加上日中關係惡化，印度於2003年起超越中共，成為日本ODA的最大接受國。

ODA乃是日本經濟外交的重要一環，由日圓貸款、無償資金協力、技術協力等三項構成，提供低利率貸款給ODA接受國整備經濟發展所需的基礎設施，提供日本企業赴該國投資的有利環境（マドオチャンダ・ゴージュ 2017）。基於印度的地緣戰略價值，以及緊密化日印關係的戰略構想，日本近年來始終居於提供印度ODA國家的首位（表1）。日本提供印度ODA，主要使用在建構電力與運輸等基礎設施、投資環境整備、以及人才養成等領域，置重點於以下三個領域：強化印度國內主要產業都市或工業園區之間、印度東北各邦與印度本土以及與東南亞之間的「連結性」（connectivity）；強化印度產業競爭力；支援印度持續成長可能與涵蓋各層面的經濟發展等。日本外務省強調，提供印度ODA乃是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構成要素（外務省 2016a）。有鑑於印度感染COVID-19病毒人數眾多，日本駐印度大使鈴木哲於2020年8月31日，在新德里與印度財政部經濟局官員以換文方式，承諾日本將提供ODA無償援助資金10億日圓等值醫療器材（外務省 2020b），以及提供500億為上限的緊急支援日圓貸款給印度（外務省 2020c），以協助印度強化抗疫能力，展現兩國緊密的戰略夥伴關係。

表1 日本提供印度ODA統計（2013~17年度，單位：億日圓）

年度	日圓貸款	無償資金協力	技術協力	合計
2013	3,650.59	16.62	43.62	3,710.83
2014	1,186.43	2.17	44.86	1,233.46
2015	3,664.78	1.58	50.97	3,717.33
2016	3,713.45	1.10	159.50	3,874.05
2017	3,841.32	16	90.67	3,947.99
迄今累計	56,970.17	939.48	733.17	58,642.82

資料來源：外務省（2018a）。

隨著日本對印ODA的增加，日印兩國經濟關係日漸緊密，並反映在兩國貿易以及日本對印FDI總額（如表2）。誠如凱爾德（Kent Calder）所言，經

濟是國家安全的基礎，共同確保能源資源安全、以及在貿易、投資（資本流通）、技術等領域的合作關係，都是構成同盟或戰略夥伴關係的經濟基礎（渡辺将人 2008），加上企圖透過整備基礎設施以提升產業競爭力的印度「莫迪經濟學」（Modinomics），與日本「安倍經濟學」（Abenomics）第三支箭中的「基礎建設系統出口戰略」具有互補作用，特別是日本協助印度提升國內、以及與南亞周邊國家、東南亞區域間的連結性，為日印經貿發展帶來新契機。誠如前述安倍在印度國會演講所言，「強大印度是日本的利益，強大日本是印度的利益」，互補型的日印兩國經濟合作可帶來雙贏的結果，更有助於戰略夥伴關係的緊密化。

表2 日本對印度進出口與FDI統計（2010~19年，單位：億日圓）

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出口	7,917	8,821	8,454	8,390	8,610	9,813	8,892	10,435	12,362	11,965
進口	4,989	5,433	5,585	6,903	7,391	5,887	5,093	6,187	5,853	5,855
FDI	2,411	1,814	2,228	2,102	2,824	3,685	5,639	3,566	3,873	6,240

資料來源：外務省（2021）。

2014年9月，安倍在東京的日印高峰會議上表明，將倍增對印FDI金額與赴印投資的日本企業數，特別是協助印度國內以及與區域外連結的基礎設施、提升印度製造業能力，期待兩國經濟政策發揮協同增效作用。為此，雙方發表「日印投資促進夥伴關係」，安倍承諾將在今後5年內挹注印度包括ODA在內的官民投融資3.5兆日圓（外務省 2014）。為協助印度推動「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構想，日本經濟產業省與印度商工省於2017年9月簽署「日印投資促進路線圖」，獎勵日本企業赴「德里-孟買產業走廊」（Delhi-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 以下簡稱：DMIC）投資設廠等強化投資促進活動、協助印度訓練技術人才、以及整備專供日本企業投資設廠的工業園區等措施。DMIC 乃是日本向印度提出的構想，包括由日本提供ODA鋪設長達1500公里的印度「貨物運輸專用鐵道」（Dedicated Freight Corridor）西線，連結印度西北部產

業都市、構成DMIC的運輸骨幹（関根仁博 2010, 15-17）。根據日本駐印度大使館統計，赴印度投資的日本企業數，由2009年627家逐年增加為2019年1454家（外務省 2021）。

雖然日印《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以下簡稱：EPA）於2011年8月生效，惟因印度經濟景氣低迷，再加上不敵中共廉價商品的競爭、日本企業在印度製造網絡與FDI有待擴大等因素，以致EPA對擴大日印貿易效果有限（小島真 2017, 197-220）。如表2所示，2010年以降的日本對印出口僅緩慢上揚，而印度對日出口於2014年達到高峰後下滑，2018年日印貿易總額甚至只有中印貿易的五分之一。⁷不過，隨著中國大陸市場磁吸力道的減弱、近期中印國境衝突波及兩國經貿關係，再加上印度積極整備基礎設施與改善投資環境的情況下，具有戰略意涵的日印經濟合作關係逐漸緊密化，將是指日可待。例如，近兩年日本對印FDI快速成長、對印ODA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日本企業積極參與印度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日本企業投資印度的意願與商機（小島真 2020）。印度退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決定，雖然導致日印兩國共同牽制中共的構想胎死腹中，但是，基於自外於亞洲經濟發展的憂慮，印度勢必更加重視與日本的雙邊經濟關係。

二、中共威脅導致日印增強安全合作

2000年8月重新啓動的日印關係，由後冷戰初期「經濟上日本支援印度」形態，轉變為「為牽制中共而建構夥伴關係」的戰略合作形態，中共崛起因素扮演著催化劑角色（三船惠美 2017, 121-142）。佐野秀太郎指出，中共在中印國境地帶以及東海的獨斷舉動，驅動日印兩國深化安全合作；而中共持續在

⁷ 莫迪執政後的印中關係處於「政冷經熱」狀態。中共是印度最大的進口國與貿易赤字國，為削減印中貿易赤字以及提倡印度製造，瞄準印度內需的中方企業擴大對印投資的可能性高。不僅如此，印度雖然杯葛一帶一路，卻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最大貸款國，迄2019年9月為止，AIIB共計融資給印度的基礎設施案件約30億美元，佔AIIB對外融資30%。熊谷章太郎（2020, 61-81）。

南海的獨斷舉動，以及在印度洋增強軍事存在，最終迫使日印兩國緊密化海洋安全合作（Sano 2017）。中共2020年度國防預算1.268兆人民幣，大約是日本的4倍，挾其崛起軍力以強化對東海與南海的支配權，升高日本的不安。對印度而言，與日本發展緊密關係的動機，除了經濟發展誘因之外，也具有平衡中共威脅的思考。瑪莎爾（Arpita Mathur）認為，印度是探討日本因應中共崛起與美國霸權衰退的戰略挑戰之顯著變數，日印兩國在對應中共崛起議題上具有共同戰略利益（Mathur 2013, 127-148）。中共提出「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構想，企圖在印度洋周邊建構可作為未來海軍前進部署的基地，甚至以反恐、反海盜為名，積極增強在印度洋的軍事存在，讓印度感受到芒刺在背（伏見威蕃訊 2008, 70）。誠如拉賈戈帕蘭（Rajagopalan 2017）所言，印度與美國結盟，透過美國協助強化軍力，是因應中共威脅的最佳戰略選項，而日本既是美國同盟國，也擁有協助提升印度軍力的高科技，自然是印度結盟的理想對象。

安倍第一次內閣時期，致力於將日印兩國海洋安全合作，擴大為納入美國與澳洲的四國架構。美日印澳四國於2007年，舉辦首次局長級安全對話，並且實施外加新加坡的五國海軍聯合演訓「馬拉巴爾」（Malabar），浮現四方安全合作的輪廓。其後，四方對話雖然因為中共反彈而中斷，日印兩國的安全合作並未受到影響，先後發表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及其行動計劃，持續建構雙邊與多邊戰略對話與合作架構（Mukherjee and Yazaki 2016, 1-31；外務省 2009a）。2012年6月，日印兩國海軍在東京外海相模灣首度實施聯合演訓，為共同確保海洋交通線安全的合作奠定基礎。2013年5月，印度首相辛哈赴東京訪問，與再次執政的安倍達成共識，決定今後兩國海軍定期實施聯合演訓（外務省 2013）。同年12月，日印海軍在印度清奈（Chennai）外海實施第二次聯合演訓，開啓雙方海軍定期演訓機制。雖然如此，辛哈為避免刺激中共，依然婉拒日本再度參與美印兩國定期實施的「馬拉巴爾」演訓。

不過，莫迪政府成立後，不但邀請日本參加「馬拉巴爾」，甚至於2016年允許日本成為正式成員，美日印三國海軍定期演訓機制於焉形成。不僅如此，日印兩國陸軍與空軍亦於2018年，首度在印度實施聯合演訓，讓日印兩國三軍都具備聯合演訓機制。再加上日印兩國已締結《防衛裝備品・技術移

轉協定》、《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以及ACSA協定，有助於強化兩國部隊間的「相互可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使用對方基地進行後勤補給，強化日印特別戰略夥伴關係的軍事基礎。為落實防衛裝備與技術移轉合作，日印雙方成立「防衛裝備・技術協力事務層級協議」（Joint Working Group on Defenc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並且於2017年9月首次召開官民共同參與的「防衛產業論壇」，期待以官民合作的形態強化兩國軍工產業合作（防衛省・自衛隊 2019）。換言之，日印戰略夥伴關係在軍事層面的制度化發展，不僅具備三個軍種聯合演訓與高層互訪、武器裝備的共同開發與移轉、軍事情報交換與後勤支援等機制，甚至與美國、澳洲建立起兩組三邊或四邊的海軍聯合演訓，以因應中共在印太海域增強兵力投射的挑戰。其中，值得矚目的是，儘管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間以及日相安倍宣布辭職情況下，日本駐印度大使鈴木哲依然於2020年9月9日，在新德里與印度國防部次長庫瑪簽署《日印ACSA》協定，進一步深化日印兩國軍事合作關係（外務省 2020d）。

誠如沃爾特（Walt 1997, 170）所言，對話架構的制度化與共同價值觀，乃是同盟關係不可或缺的條件。以日相小泉訪印為契機，日印兩國啟動首腦定期互訪，逐步建構外交、海洋安全、軍事等雙邊交流與戰略對話的制度化，以及加入美國或澳洲的三邊或四邊戰略對話（表3）。2019年11月30日，日印兩國將2010年啟動的次長級「2+2會議」提升為部長級對話，並且決定在2020年首度實施兩國戰鬥機共同訓練（外務省 2019b）。⁸利馬耶（Satu Limaye）指出，中共因素是促使美日印三國接近的重要原因，美國認為日印強化戰略夥伴關係有助於亞太防衛，將印度定位為美國的「重要防衛夥伴」（Major Defense Partner），積極建構美日印三邊局長級、部長級戰略對話與安全合作架構（サトウ・リマイエ 2017, 101-119）。其次，日印澳三國也於2015年6月，在印度首度召開三邊外交次長級對話，與美日印三國架構相輔相成，凸顯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緊密性。2017年11月12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復活，其後

⁸ 預定於2020年首度實施的日印戰鬥機共同訓練，因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而延期，迄今（2021年2月）仍未實施。

以每年兩次的頻率召開，並且於2019年9月26日，在紐約召開第一次部長級對話。翌年10月6日，雖然COVID-19肆虐全球，第二次部長級對話依然在東京召開，並且決定予以定期化（外務省 2020e）。

表3 日印防衛合作與安全戰略對話現況

性質	成果與現況
外交與安全戰略對話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2008年發表「安全保障共同宣言」、2009年發表促進安保合作「行動計畫」 2. 兩國間：印度國家安全顧問與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對話、外長戰略對話、外交次長對話、外交與國防部長「2+2會議」 3. 三國間：日印美領袖/部長/局長級對話、日印澳次長級對話 4. 四國間：美日印澳局長級/部長級對話
海上執法機關交流與對話	自2000年以降，每年實施日本海上保安廳與印度海岸警衛隊的共同訓練，以及機關首長定期會晤
防衛交流與合作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國防部長定期會談（2009年以降每年實施）、國防次長定期政策對話、軍事高層互訪 2. 2015年12月簽署日印《防衛裝備品・技術移轉協定》、《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2020年9月簽署ACSA協定
核能合作	2016年11月簽署《日印核能和平合作使用協議》
陸海空各軍種聯合軍事演訓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2012年起，日本海上自衛隊與印度海軍定期實施聯合演訓 2. 2018年10月，日本陸上自衛隊首度在印度東北邦與印度陸軍實施聯合演訓「達摩守護者」（Dharma Guardian） 3. 2016年，美日印三國海軍定期演訓「馬拉巴爾」機制正式成立；2020年11月再加入澳洲。 4. 2018年12月，日本航空自衛隊與印度空軍在印度北部實施第一次聯合演訓「親友-18」（Shinyu Maitri-18），日方並以觀察員身分參加美印空軍聯合演訓「應對印度」（Cope India）。

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自日本外務省官網製作。

三、以印太區域為合作場域

印太海域是全球經貿運輸大動脈，從印度洋西岸非洲之角、連接紅海和亞丁灣，再從東岸孟加拉灣與安達曼海，穿越麻六甲海峽或巽他海峽、龍目海峽等連結西太平洋，向來被日本視為生命線。面對中共在南海建構軍事據點、強化在印度洋的軍事存在等措施，日本除了強化日印戰略夥伴關係、拉攏英法兩國介入南海之外，更透過協助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國強化海洋安全合作以資反制（Hart 2017）。另一方面，印度積極推動挺進亞太區域的東進政策，將其視為印度參與亞太事務的基石（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7），日印戰略夥伴關係自然成為其東進的戰略依託。

2015年12月，安倍與莫迪在新德里發表「日印願景2025」共同聲明，勾勒雙方確保印太區域和平與繁榮的具體措施，以及促進印太區域投資與合作確保和平穩定的路線圖。雙方期待印度的東進政策與日本的「高品質基礎建設夥伴關係」構想發揮共振效應，促進日印兩國經濟發展以及印太區域的繁榮。2016年8月，安倍發表印太戰略，再度表明將透過強化印太區域的連結性，以促進區域穩定與繁榮的決心。同年11月，安倍與莫迪在東京達成共同締造自由開放印太的共識，勾勒雙方推動從東南亞沿著歐亞大陸塊外緣連結非洲的「亞非成長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構想，提升印太區域的經濟、社會、連結性、「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以及海洋交通線安全（外務省 2016b）。誠如印度智庫學者所言，對美國川普（Donald Trump）政府是否持續提供安全承諾之憂慮，以及中共在印太區域強化軍事存在之不安，導致日印兩國積極提升雙方在經濟面與安全面的合作（Jagannath P. Panda 2020, 1-20）。

2017年9月，莫迪與安倍再度發表共同聲明，強調日印兩國將提升海洋安全合作與印太區域的連結性、以及與ASEAN合作，並且強化與美國、澳洲等國之間的兩組三邊合作。同時，為強化印太海洋交通線安全，雙方將關注兩國海軍在反潛作戰等領域的緊密合作（外務省 2017）。其中，日本協助印度提升印度本土與東北各邦、南亞周邊、東南亞之間的連結性，不但有助於日本出口基礎設施系統以促進日本經濟再生，也有助於印度與ASEAN的經貿發展，

甚至協助印度補強東北防衛的脆弱性，具有經濟與國防的雙重意涵。⁹ 誠如前印度外交部次長渥華（Anil Wadhwa）所言，印度基於國防安全而致力於提升東北國境連結性，日本扮演協助印度的重要夥伴（Wadhwa 2018）。其次，印度也積極建構清奈與緬甸實兌（Sittwe）、吐瓦（Dawei）之間的海洋交通線，與經由印度東北進入緬甸的陸路交通線匯合，不但提升印度與東南亞之間的連結性，也凸顯孟加拉灣與安達曼海的地緣戰略對印度的重要性（堀本武功 2017, 3-10）。另一方面，美國也決定與日印兩國合作，支援民間企業投資印太區域具戰略價值的港灣基礎設施建設，以稀釋化一帶一路構想的影響力（日本經濟新聞 2018b）。

有鑒於近年來中共海軍頻繁進出印度洋，印度積極強化可扼制麻六甲海峽西北端出入口的安達曼-尼科巴群島（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三軍聯合作戰司令部的戰力（多維新聞網 2019）。其次，印度允許日本企業建構島上發電與供電系統，以及與清奈之間的海底光纖電纜等基礎設施，就如同印度接受日本援助開發東北各邦一樣，是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緊密化的象徵（Barry 2016）。此外，印度考慮與美日合作在蘇門答臘與孟加拉灣之間，鋪設海底「聲紋偵測感應器」（sound surveillance sensors）鏈，以監控中共潛艇進出印度洋的動態（Singh 2016）。另一方面，針對中共取得漢班托塔（Hambantota）港，日印兩國則聯手協助開發斯里蘭卡在英國殖民時期的海軍基地亭可馬里（Trincomalee）港，並援助新建可倫坡（Colombo）港貨櫃碼頭以資抗衡（長尾賢 2017b）。對印度而言，印度洋是具有高度戰略意涵的後院，如果國際社會期待印度擔負起抗衡中共的角色，就應該協助印度發展國力，而日本在過去5年間，扮演協助印度發展的最重要戰略夥伴（フォーリン・プレスセンター 2019）。

以再度加入「馬拉巴爾」演訓為契機，日本自2017年起每年派遣被稱為直升機航母、「出雲」（IZUMO）級護衛艦（Helicopter Destroyer, DDH）編

⁹ 印度東北部存在追求獨立勢力，以及與中共具有主權爭議、被稱為藏南的阿魯納恰爾邦，而印度本土與東北部必須仰賴寬僅14英哩的西里古里（Siliguri）走廊，造成2017年夏中印國境部隊在洞朗（Donglang）對峙事件的背後因素，存在印度對東北防衛脆弱性的不安（安迪 2017）。

隊赴南海與印度洋實施長期演訓，讓日印海軍合作日益緊密。由於日印兩國已簽署ACSA協定，與美日ACSA協定、美印《後勤交流備忘錄》（Logistics Exchange Memorandum of Agreement）相結合，印度或可提供安達曼-尼科巴群島軍事設施給日美兩國使用，有助於強化美日印三軍的相互可操作性（Tan and Hussain 2020; Sano 2020）。另一方面，美國國防部於2019年6月公布《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表明，美日同盟是印太區域和平與繁榮的基石，印度則是美國的最親密同盟與夥伴，美日印戰略夥伴關係是美國確保印太區域自由與開放的合作機制（DoD 2019），為日印戰略夥伴關係注入強心劑。不僅如此，日本於2018年底公布新版《防衛計畫大綱》表明，將在海洋安全等廣泛領域，與印度進行以共同演訓、防衛裝備與技術為主軸的軍事合作，並且強化日美印、日美澳三邊軍事合作（防衛省·自衛隊 2018）。在此基礎上，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定期化召開部長級對話，有助於強化日印特別戰略夥伴關係的多層次合作架構。

不過，日印兩國強化在印太區域的戰略合作，有別於與中共針鋒相對的美國印太戰略。事實上，以日相安倍於2017年5月派遣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出席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以及中共國務委員楊潔篪於兩周後訪問日本為契機，因釣魚臺島嶼國有化事件而惡化的日中關係逐漸回暖，不但恢復中斷7年的外長與首相（總理）的互訪、重啟高級別經濟對話，也簽署延宕多年的「海空聯絡機制」備忘錄，以及經貿金融等領域合作的52項協定。安倍於2018年10月訪問北京之際，雙方同意以「將競爭轉向協調」、「互為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發展自由公正的貿易體制」作為發展日中關係的三原則，建構兩國企業共同參與「第三方市場合作機制」（外務省 2018b；國際協力銀行 2018）。為因應日中關係的改善，以及消除日本與美國合作建構反中集團的疑慮，日本外務省官網在安倍訪中前夕，將「自由開放印太戰略」改為「自由開放印太構想」，其後安倍也絕口不提印太戰略的「戰略」二字。

另一方面，在經歷2017年中印國境部隊在洞朗對峙事件，印度首相莫迪於2018年4月在武漢與習近平進行非正式峰會，企圖修補瀕臨破裂的中印關係（蘋果日報 2018）。印度學者將此峰會視為重新設定印中關係的契機，原因

在於美國對印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為避免印中兩國直接衝突（伊豆山真理 2019, 2-9）。6月1日，莫迪在「香格里拉對話」（The Shangri-La Dialogue）演講壇上表示，武漢峰會讓他意識到強固且穩定的印中關係，是全球和平與進步的重要因素。莫迪強調，印度不將印太區域視為對他國的戰略，或者是限制成員加入的俱樂部，藉此向北京伸出友好的橄欖枝（Ministry of External, Government of India 2018）。在此背景下，莫迪於翌年11月4日發表「自由開放與包容的印太」（Free, Open, and Inclusive Indo-Pacific）倡議，似乎意在與針對中共的美國印太戰略劃清界線。

不過，在COVID-19全球肆虐之際，中印國境部隊於2020年6月在爭議邊界爆發肢體衝突，造成1962年中印國境戰爭以來最大的人員傷亡，導致雙方各自增強邊境部隊部署的緊張狀態。其後，印度媒體傳出印度海軍強化安達曼-尼科巴群島附近航道的水下偵測能力，以期監控中共海軍進出麻六甲海峽的動態，甚至派遣軍艦進入南海（中央通訊社 2020）。另一方面，日本新首相菅義偉將中共外長王毅來訪日程，推遲到日本舉辦美日印澳四方部長級對話，以及美日印澳四國海軍實施「馬拉巴爾」演訓之後，不無向中方展現四方安全合作關係的政治意涵。誠如莫漢（Mohan 2017）所言，莫迪加入四方安全合作機制，並非意味著印度放棄獨立自主外交路線，而是為確保在核心議題上牽制中共的籌碼。儘管印度避免過度刺激中共而對四方安全合作保持若即若離的姿態，但是，中共過度自信的強勢姿態讓印度感到憂慮，迫使印度向美國及其同盟國傾斜，與日本簽署ACSA協定、定期化四方部長級對話機制、以及同意澳洲再度參與「馬拉巴爾」演訓（Wyeth 2020）。

伍、結論

本文以「結盟」的概念，探討日印兩國基於安全與經濟的動機，以戰略夥伴關係之名，發展戰略合作及其制度化的過程。對印度而言，日本是其跨入亞太區域的重要經濟夥伴，日本透過ODA協助印度提升與東南亞之間的連結性，特別是兼具國防戰略價值的印度本土與東北各邦的交通連結，奠定日印兩國在印太區域經濟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對日本而言，基於分散對中投資的

風險，印度經濟發展的需求以及龐大消費市場，為日本企業提供投資印度的商機。因此，確保印太區域的自由與繁榮的共同利益，即成為日印兩國締結戰略夥伴關係的經濟動機。其次，由於中共積極強化印太海域的軍事存在，成為日印兩國共通的懸念事項，再加上日印兩國各自與中共存在領土爭議，合作牽制中共在印太區域的獨斷舉動，成為雙方締結戰略夥伴關係的安全動機。但是，日印雙方並未承諾相互防衛來自中共的威脅。建構多層次的政治、外交、安全與戰略對話、軍事交流與聯合軍事演習，卻又不提供相互防衛的承諾，乃是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特徵，也意味著日印兩國不具備同盟的核心要素。

在建構緊密經濟發展合作的同時，日印兩國也陸續建構外交、安全、戰略等領域雙邊與多邊戰略對話，以及陸海空三軍共同訓練、特別是與美國、澳洲海軍聯合演訓的「馬拉巴爾」等軍事合作機制，讓部分論者認為日印兩國已是準同盟關係。不過，以傳統同盟理論、主要是防衛承諾的觀點來看，現階段的日印戰略夥伴關係，顯然尚未達到同盟或準同盟的程度。從理論層面來看，戰略夥伴關係不等同於同盟，而日印兩國也各自存在難以跨越的同盟門檻。從實踐層面來看，日印戰略夥伴關係是為實現雙方共同戰略目標的「目標驅動」，不是承諾防衛或嚇阻威脅的「威脅驅動」。其次，印度堅持戰略自主、不捲入與國家利益無關的紛爭，日本則受限於憲法第九條規範，以及反對《和平安全法制》所展現的和平主義或不願捲入他國戰爭的民意制約，必然限縮日印兩國發展同盟的空間。再加上雙方顧慮到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第三核武大國的中共採取反制措施。例如，中共可以對日印兩國實施經濟制裁，或者是在軍事上增強針對性的核武部署、升高中印國境與釣魚臺周邊海域的緊張關係，甚至與巴基斯坦或北韓合作建構以印度、日本為對象的敵對同盟，都是日印兩國所要避免的事態。

連結美國、澳洲等民主海洋國家，建構自由、開放與繁榮的印太區域，成為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戰略目標，在此目標驅動下，雙方合作提升印太區域的連結性、經濟合作、以及確保海洋交通線安全。中共崛起導致區域權力結構失衡，驅動日印兩國結盟——締結戰略夥伴關係或同盟，乃是毋庸置疑。不過，誠如前述史奈德所言，同盟要付出被捲入或背棄、限縮本國戰略選項等同盟困境的風險或代價，日印兩國雖然擁有共通的民主價值、在印太區域的共同利

益、制度化的政治、經濟、外交、戰略等領域之對話與合作機制、以及陸海空三軍共同演訓等同盟的構成要素，但是，並非意味著雙方願意付出代價---分攤責任或風險，而這正是同盟最重要的構成要素之一。更重要的是，日印兩國雖然共有中共的威脅認知，但是，對應威脅的途徑卻未必一致。印度不至於為發展印日同盟關係而犧牲印中經貿關係，從莫迪政府對印太戰略不即不離的態度，不難看出其在日中兩國之間取得平衡的意圖；而日本在強化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同時，也務實地改善與中共關係。日印兩國對中政策的務實性，主要在於雙方與中共具有緊密的經濟相互依賴關係。在此情況下，日印兩國在現階段的戰略夥伴關係，很難套用在以中共為假想敵的同盟框架。

不過，即使日印雙方在現階段無法承諾相互支援對應與中共的軍事衝突，但是，日印兩國的防衛合作，勢必讓中共陷入必須同時挹注國防資源在東海與中印國境的海陸兩面戰線、備多力分的困境，有助於減輕中共對日本或印度的軍事壓力。因此，日印特別戰略夥伴關係是一種具有促進包括經濟上與安全戰略上共同利益的政策議題取向、「結盟而不同盟」的戰略合作關係，其發展動向將受到今後日中與印中關係演變，或者是中共在印太區域是否依然持續強悍推動所謂「戰狼外交」的影響。

（收件：108年11月9日，接受：110年1月28日）

A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Japan and India: New Patterns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Hsien-Sen Lin

Professor/Chairma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stitutionalized development of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defense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India since 2005, and whether or not both countries will move toward an alliance. To clarify further, Japan and India have disputes ove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with China, and China has actively expanded it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us, balancing China's threa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otive for Japan-India to develop strategic cooperation. Since September 2014, Japan and India have promoted the strategic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to a "special strategic global partnership," in which it outlined a roadmap for 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to jointly develop the freedom, openness,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sea-lanes in the Indo-Pacific Ocean.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domestic consensus and power projection, as well as concerns about China's countermeasures, it is impossible for Japan and India to form an alliance targeting China now or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 Alignment, Strategic Partnership, East Act Policy,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Malabar

參考文獻

- 王義桅、唐小松、潘崇易、張登及譯，John J. Mearsheimaer著，2014，《大國政治的悲劇》，臺北：麥田。Wang, Yizhen, Xiao-song Tang, Chong-Yi Pan, and Deng-Ji Zhang, trans. John J. Mearsheimaer. 2014. *Daguo zhengzhi de beiju*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Taipei: Maitian Books.
- 中央通訊社，2020，〈印度軍艦部署南海 引發中國抗議不滿〉，<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008310120.aspx>，查閱時間：2021/02/03。Central News Agency. 2020. “Yindù jūnjiàn bùshǔ nánhǎi yǐnfā zhōngguó kàngyì bùmǎn” [Indian warship deploy in South China Sea triggers Chinese protests]. (Accessed on February 3, 2021).
- 多維新聞網，2019，〈印度海上飛地新建空軍設施 監視中國戰艦〉，<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news/2019-01-25/60114873.html>，查閱時間：2019/06/19。Duowei Xinwen Wang. 2019. “Yindu haishàng feidi xinjian kongjun sheshi jianshi zhongguo zhanjian” [New Air Force Facilities in Indian Offshore Enclaves Monitoring Chinese Warships]. (Accessed on June 19, 2019).
- 安迪，2017，〈印度西里古里走廊的安全關切及其啓示〉，<http://www.cwzg.cn/politics/201709/38294.html>，查閱時間：2019/05/06。An, Di. 2017. “Yindu xili guli zoulang de anquan guanqie ji qi qishi” [Security Concern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Siliguri Corridor in India]. (Accessed on May 6, 2019).
- 李靜杰，2002，〈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俄羅斯學報》，2: 97-114。Li, Jingjie. 2002. “zhōng é zhànlüè xiézuò huǒbàn guānxì” [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Russian Journal*, 2: 97-114.
- 林賢參，2018，〈日印關係與印度太平洋戰略〉，《歐亞研究》，4: 51。Lin, Hsiensen. 2018. “Rì yìn guānxì yǔ yìndù tàipíngyáng zhànlüè” [Japan-India Relations and Indo-Pacific Strategy]. *Eurasian Studies Quarterly*, 4: 51.
- 美國之音，2017，〈呼之欲出的美印太戰略（二）：制勝方略？〉，<https://>

- www.voachinese.com/a/us-india-20171110/4110241.html，查閱時間：2019/06/19。Meiguo zhi yin. 2017. “huzhiyuchu di mei yin tai zhanlue (2): Zhisheng fanglue?” [The US-India Strategy (2): What is the Winning Strategy?]. (Accessed on June 19, 2019).
- 蘋果日報，2018，〈莫迪訪華 一日六度晤習〉，<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180428/20375360>，查閱時間：2019/08/01。Apple Daily. 2018. “Mo di fang hua yi ri liu du wu xi” [Modi’s Visit to China, Meet Xi Jinping Six Times One Day] (Accessed on August 1, 2019).
- Bajpai, Kanti. 2019. “India and Japan: Strategic Partners for the 21st Century.” <https://www.cppr.in/articles/india-and-japan-strategic-partners-for-the-21st-century>(June 5, 2020).
- Barry, Ellen. 2016. “As India Collaborates with Japan on Islands, It Looks to Check China.” https://www.nytimes.com/2016/03/12/world/asia/india-japan-china-andaman-nicobar-islands.html?smid=tw-share&_r=0 (June 19 2019).
- Basu, Titli. 2016. “India in Japan’s Geo-strategic Outlook.” *Journal of Defence Studies*, 10 (3): 41-64.
- Chand, Bibek, Zenel Garcia, and Kevin Modlin. 2018. “Southeast Asian Hedging and Indo-Japanese Strategies for Regional Balance—Managing China’s Rise.”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 1 (2): 23-56.
- Chaudhuri, Rudra. 2009. “Strategic Partnerships.” <http://www.india-seminar.com/2009/599.htm> (March 10, 2019).
- Chinoy, Sujana R. 2020. “Foreword.” In Jagannath P. Panda, ed., *Scaling India-Japan Cooperation in Indo-Pacific and Beyond 2025: Corridors, Connectivity and Contours*, pp. x-xii. New Delhi, India: KW Publishers Pvt Ltd.
- DoD. 2019.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May/31/2002139210/-1/-1/1/DOD_INDO_PACIFIC_STRATEGY_REPORT_JUNE_2019.PDF (July 20, 2019).
- Garnaut, John. 2014. “Australia-Japan Military Ties Are a ‘Quasi-alliance’, Say

- Officials.” <https://www.smh.com.au/national/australiajapan-military-ties-are-a-quasi-alliance-say-officials-20141026-11c4bi.html> (March 27, 2019).
- Hart, Michael. 2017. “Japan’s Maritime Diplomacy Mission in Southeast Asia.”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8/japans-maritime-diplomacy-mission-in-southeast-asia/> (June 17, 2019).
- Hussain, Nazia, and Tan Ming Hui. 2019. “Japan and India Achieve Alignment without Alliance.” <https://www.policyforum.net/japan-and-india-achieve-alignment-without-alliance/> (May 29, 2020).
- Joshi, Yogesh, and Harsh V. Pant. 2015. “Indo-Japan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Power Transition in Asia.” *India Review*, 14 (3): 312-329.
- Khilnani, Sunil, Rajiv Kumar, Pratap B. Mehta, Prakash Menon, Nandam Nilekani, Srinath Raghavan, Shyam Saran, and Siddharth Varadarajan. 2012.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http://cprindia.org/research/reports/nonalignment-20-foreign-and-strategic-policy-india-twenty-first-century> (March 18, 2019).
- Kumar, Satish, S.D. Pradhan, Kanwal Sibal, Rahul Bedi and Bidisha Ganguly. 2011. “India’s Strategic Partners: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http://www.fnsr.org/files/Indias_Strategic.pdf (March 18, 2019).
- Lynch III, F. Thomas, and James J. Przystup. 2017. “India-Jap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Strategy in the Indo-Asia-Pacific Region.” <https://ndupress.ndu.edu/Portals/68/Documents/stratperspective/inss/Strategic-Perspectives-24.pdf?ver=2017-03-14-123654-447> (April 1, 2019).
- Mathur, Arpita. 2013. “India and Japan: Sharing Strategic Interests?” In Purnendra Jain and Lam Peng Er, eds., *Japan’s Strategic Challenges in a Changing Regional Environment*, pp.127-148.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 Menon, Rajan. 2003. “The End of Alliances.” *World Policy Journal*, 20 (2): 1-20.
- Ministry of External (Government of India). 2018.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http://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_Ministers_Keynote_Address_at_Shangri_La_Dialogue_

- June_01_2018 (May 28, 2019).
-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7. “India-Australia-Japan-U.S. Consultations on Indo-Pacific.” https://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9110/IndiaAustraliaJapanUS_Consultations_on_IndoPacific_November_12_2017 (March 8, 2019).
- Mohan, C. Raja. 2006. *Impossible Allies: Nuclear India,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Order*. New Delhi, India: India Research Press.
- Mohan, C. Raja. 2007. “Japan and India: The Making of a New Alliance?” <https://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rsis/974-japan-and-india-the-making-of/#.XuXuZUUzY2x> (May 31, 2020).
- Mohan, C. Raja. 2017. “India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Quad.” https://www.isas.nus.edu.sg/wp-content/uploads/media/isas_papers/ISAS%20Briefs%20No.%20525-%20India%20and%20the%20Resurrection%20of%20the%20Quad.pdf (June 27, 2019).
- Mohan, Rajan. 2006. “Indi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 85 (4): 17-32.
- Mukherjee, Rohan, and Anthony Yazaki. 2016. “Introducti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Rohan Mukherjee and Anthony Yazaki, eds., *Poised for Partnership: Deepening India-Japan Relations in the Asian Century*, pp.1-31. Northants,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kherjee, Rohan. 2018. “Japan’s Strategic Outreach to India and the Prospects of a Japan–India Alli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94 (4): 835-859.
- Nadkarni, Vidya. 2010.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n Asia: Balancing without Alliances.”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21aOAgAAQBAJ&pg=PT85&hl=zh-TW&source=gbs_toc_r&cad=3#v=onepage&q&f=true (June 5, 2020).
- Panda, Jagannath P. 2020. “India-Japan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A Primer.” In Jagannath P. Panda, ed., *Scaling India-Japan Cooperation in Indo-Pacific and Beyond 2025: Corridors, Connectivity and Contours*, pp.1-20. New Delhi,

India: KW Publishers Pvt Ltd.

- Paul, Joshy M. 2012. "India-Japan Security Cooperation: A New Era of Partnership in Asia." *Maritime Affairs*, 8 (1): 31-50.
- Rajagopalan, Rajesh. 2017. "India's Strategic Choices: Chin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ia." <https://carnegieindia.org/2017/09/14/india-s-strategic-choices-china-and-balance-of-power-in-asia-pub-73108> (May 7, 2019).
- Sano, Shutaro. 2017. "Japan-India Security Cooperation: Building a Solid Foundation amid Uncertainty." <https://www.csis.org/programs/japan-chair/strategic-japan-working-papers> (April 12, 2019).
- Sano, Shutaro. 2020. "India-Japan Security Cooperation: Challenges in Aligning with their Respectiv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Initiatives." <https://www.raksha-anirveda.com/india-japan-security-cooperation-challenges-in-aligning-with-their-respective-free-and-open-indo-pacific-initiatives/> (June 22, 2020).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 72-107.
- Sibal, Kanwal. 2012. "Strategic Relations Suit India." <https://www.indiatoday.in/opinion/kanwal-sibal/story/strategic-relations-suit-india-india-today-125309-2012-12-26> (April 27, 2019).
- Singh, Abhijit. 2016. "India's 'Undersea Wall' in the Eastern Indian Ocean." <https://amti.csis.org/indias-undersea-wall-eastern-indian-ocean/> (July 6, 2019).
- Singh, Swaran, and Lilian Yamamoto. 2016. "Quads and Triangles: Locating Japan in India's Act East Policy." *Global Outlook*, 1 (1): 111-124.
- Snyder, Glenn H. 1984.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36 (4): 461-495.
- Snyder, Glenn H. 1990.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1): 104-106.
- Snyder, Glenn H. 2007. *Alliance Politics*. New York,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uri, Anirudh. 2007. "India and Japan: Congruence, at Last."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07/06/09/india-and-japan-congruence-at-last->

pub-19204 (June 5, 2020).

Tan, Ming Hui, and Nazia Hussain. 2020. “Japan-India: An Indigenous Indo-Pacific Axis.”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3/japan-india-an-indigenous-indo-pacific-axis/> (May 9, 2020).

Wadhwa, Anil. 2018. “India’s Act East Policy and India-Japan Security Cooperation.” *Contemporary India Forum Quarterly Review*, 39 (Autumn): 2-14.

Walt, Stephen M. 1990.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lt, Stephen M. 1997.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39 (1): 156-179.

Wilkins, Thomas S. 2011. “Japan’s Alliance Diversific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dian and Austral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1 (1):115-155.

Wilkins, Thomas S. 2012. “Alignment, Not ‘Alliance’ – 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8: 53-76.

Wyeth, Grant. 2020. “Will India Invite Australia to the Malabar Naval Exercise?.”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7/will-india-invite-australia-to-the-malabar-naval-exercise/> (February 3, 2021).

日本文獻

阿久津博康，2010，〈日豪・日印・日韓・豪韓安全保障協力の理論的含意〉，《法学研究》，83 (3): 423-454。Akutsu, Hiroyasu. 2010. “Nichigou Nichiinn Nichikan anzenhoshou kyouryoku no rironteki kani”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Australia-Japan, India-Japan, Korea-Japan, Australia- Korea Security Cooperation]. *Legal research*, 83 (3): 423-454.

伊豆山眞理，2019，〈インドから見た中印関係 — 「リセット」と「一帯一路」への対抗の併存—〉，《現代インドフォーラム》，43:

2-9。Izuyama, Marie. 2019. “Indo kara mita chuuiinn kannkei—‘risetto’ to ‘ititaitirou’ he no taikou no heizonn”[Alternatives to BRI: India’s Approach to its Neighborhood]. *Contemporary India Forum*, 43: 2-9.

伊豆山眞理，2020，〈日印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と「中国要因」〉，<https://www.nippon.com/ja/in-depth/a06703/>，アクセス：2020/05/28。Izuyama, Marie. 2020. “Nichiinn senryakuteki pa-tona-shipu to chuugoku youinn” [Japan-In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China Factors”]. (Accessed on May 29, 2020).

川崎剛，2008，〈同盟締結理論と近代日本外交〉，『国際政治』，54: 115-128。Kawasaki, Tsuyoshi. 2008. “Doumei teiketsu riron to kindai nihon gaikou” [Theory of Alliance Conclusion and Modern Japanese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4: 115-128.

熊谷章太郎，2020，〈世界経済の潮流を左右するインドの対米・対中経済関係〉，『JRIレビュー』，75(3):61-81。Kumagai, Shotaro. 2020. “Sekai Keizai no chouryuu wo sayuu suru indo no taibei・taichuu keizai kankei” [India’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China, which shape the trends of the world economy]. *JRI Review*, 75(3):61-81.

外務省，2005，〈日印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強化のための8項目の取組〉，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sia_europe_05/india_partner.html#india_p8，アクセス：2019/05/20。Gaimushou. 2005. “Nichiinn guro-paru・pa-tona-shipu kyouka no tame no hati koumoku no torikumi” [Eight-fold Initiative for Strengthening Japan-India Global Partnership]. (Accessed on May 20, 2019).

外務省，2007，〈安倍総理のインド訪問〉，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iim_07/india_gai.html，アクセス：2019/05/20。Gaimushou. 2007. “Abe souri no Indo houmon” [Prime Minister Abe Visits India]. (Accessed on May 20, 2019).

外務省，2009a，〈日印間の「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共同宣言」に基づく安全保障協力を促進するための「行動計画」〉，<https://www.mofa>.

- go.jp/mofaj/area/india/visit/actionplan_09.html，アクセス：2020/05/09。Gaimushou, 2009. “Nichiinnkann no annzenhoshou kyouryoku ni kannsuru kyoudousennngenn ni mododuku annzenhoshou kyouryoku wo sokusinn suru tame no koudou keikaku”[Action Plan—to Advance Security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India]. (Accessed on May 9, 2019).
- 外務省，2009b，〈インド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21/5/1191565_1097.html，アクセス：2020/06/10。Gaimushou, 2009b. “Indo ni okeru tainiti yoronn chousa” [Opinion Survey on the Image of Japan in India]. (Accessed on June 10, 2020).
- 外務省，2013，〈共同声明 国交樹立60周年を超えた日インド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強化〉，<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05382.pdf>，アクセス：2021/02/03。Gaimushou. 2014. “Kyoudou seimei: kokkou juritsu 60 shuunenn wo koeta nichindo senryakuteki guro-baru・pa-tona-shippu no kyouka”[Joint Statement: Strengthening the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between Japan and India beyond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Accessed on February 3, 2021)
- 外務省，2014，〈日インド特別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ための東京宣言〉，<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50478.pdf>，アクセス：2021/02/03。Gaimushou. 2014. “Nichi indo tokubetsu senryakuteki guro-baru pa-tona-shippu”[Tokyo Declaration for Japan-India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Accessed on February 3, 2021)
- 外務省，2016a，〈対インド国別援助方針〉，<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189321.pdf>，アクセス：2021/02/03。Gaimushou, 2016a. “Tai indo kokubetsu ennjo houshinn”[Countr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olicy for India]. (Accessed on February 3, 2021).
- 外務省，2016b，〈第6回アフリカ開発会議（TICAD VI）〉，https://www.mofa.go.jp/mofaj/af2/af2/page3_001556.html，アクセス：2019/10/29。Gaimushou, 2016. “Dairokkai afurika kaihatsu kaigi VI” [Sixth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Accessed on October 29, 2019).

外務省，2017，〈日印首脳会談〉，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4_003293.html，アクセス：2019/05/21。Gaimushou, 2017. “Nichiinn shunou kaidan” [Japan-India Summit Meeting] (Accessed on May 21, 2019).

外務省，2018a，〈政府開発援助（ODA）国別データ集2018—南アジア地域：（1）インド〉，<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497951.pdf#page=66>，アクセス：2021/02/03。Gaimushou. 2018a. “Seifu kaiatsu enjo (ODA) kokubetsu de-ta shuu 2018a — minamiazia chiiki: (1) Indo”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DA) Country Data 2018a — South Asia Region: (1) India]. (Accessed on February 3, 2021).

外務省，2018b，〈安倍総理の訪中〉，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4_004452.html，アクセス：2019/9/7。Gaimushou. 2018b. “Abe souri no houchuu” [Prime Minister Abe Visits China]. (Accessed on September 7, 2019).

外務省，2019a，〈オーストラリア連邦基礎データ（二国間関係2政治・安全保障関係）〉，<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data.html#section5>，アクセス：2020/05/28。Gaimushou. 2019. “O-sutoralia rennbou kisou de-ta(nikokukann kankei 2 seizi • annzennhoshou kankei)” [Australia Basic Data(Bilateral Relations 2 Political and security relations)]. (Accessed on May 28, 2020).

外務省，2019b，〈第1回日印外務・防衛閣僚会合 共同声明〉，<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544337.pdf>，アクセス：2021/02/03。Gaimushou, 2019b. “Daiikkai nichinn gaimu • bouei kakuryou kaigou kyoudou seimei” [Joint Statement First Japan-India 2+2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Meeting]. (Accessed on February 3, 2021)

外務省，2020a，〈日・インド物品役務相互提供協定（日印ACSA）の署名〉，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8742.html，アクセス：2021/02/03。Gaimushou. 2020a. “Nichi • indo buppinn ekimu

sougo teikyou kyoutei(nichiinn ACSA) no shomei”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Concerning Reciprocal Provision of Supplies and Services Between the Self-Defense Forces of Japan and the Indian Armed Forces]. (Accessed on February 3, 2021)

外務省，2020b，〈インドに対する感染症対策及び保健・医療体制整備のための支援〉，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8719.html，アクセス：2021/02/03。Gaimushou. 2020b. “Indo ni taisuru kannzennshou taisaku oyobi hokenn・iryuu taisei seibi no tame no sienn”[Support for 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 and health / medical system development for India]. (Accessed on February 3, 2021)

外務省，2020c，〈インドに対す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危機対応のための緊急支援〉，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8718.html，アクセス：2021/02/03。Gaimushou. 2020c. “Indo ni taisuru shinngata korona uirusu kiki tiou no tame no kinnkyuu shienn”[Emergency support for India’s response to the new coronavirus crisis]. (Accessed on February 3, 2021).

外務省，2020d，〈日・インド物品役務相互提供協定（日印ACSA）の署名〉，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8742.html，アクセス：2021/02/15。Gaimushou. 2020d. “Nichi・indo buppinn yakumu sougo teikyou kyoutei (nichiinn ACSA) no shomei”[Signing of Japan-India 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cing Agreement (Japan-India ACSA)]. (Accessed on February 15, 2021).

外務省，2020e，〈第2回日米豪印外相会合〉，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6_000682.html，アクセス：2021/02/03。Gaimushou. 2020e. “Dainikai nichi bei gou in gaishou kaigou”[The Second Japan-Australia-India-U.S.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Accessed on February 3, 2021).

外務省，2021，〈インド基礎データ（二国間関係）〉，<https://www.>

mofa.go.jp/mofaj/area/india/data.html#section5，アクセス：2021/02/03。Gaimushou. 2021. “Inndo kisou de-ta (nikokukann kannkei)” [India Basic Data (Bilateral Relations)]. (Accessed on February 3, 2021).

小島眞，2017，〈インド経済の台頭と日印関係の新局面〉，堀本武功編，『現代日印関係入門』：197-22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Kozima, Makoto. 2017. “Indo keizai no taitou to nichinn kankei no shin kyokumen” [Emergence of India’s Economy and New Phase of Japan-India Relations]. In Takenori Horimoto, edit, “*Gendai nichinn kankei nyuumo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Japan-India Relations], pp.197-220.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小島眞，2020，〈日印経済関係の動向とその将来性：進む日本の対インフラ投資〉，<https://www.nippon.com/ja/in-depth/a06702/>，アクセス：2020/05/28。Kozima, Makoto. 2020. “Nichinn keizai kannkei no doukou to sono shouraisei: susumu nihonn no infura toushi” [Trends in Japan-India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ir Future: Japan’s Inward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Accessed on May 29, 2020).

国際協力銀行，2018，〈中国国家開発銀行と覚書を締結〉，<https://www.jbic.go.jp/ja/information/press/press-2018/1026-011525.html>，アクセス：2019/09/07。Kokusai kyouryoku ginkou. 2019. “CHuugoku kokka kaihatsu ginkou to oboegaki wo teiketsu” [Conclude a Memorandum with China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 (Accessed on September 7, 2019).

佐竹知彦，2019，〈「日豪同盟」の可能性〉，<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briefing/pdf/2019/201909.pdf#search='%E6%97%A5%E8%B1%AA%E6%BA%96%E5%90%8C%E7%9B%9F+%E6%97%A5%E6%9C%AC%E6%94%BF%E5%BA%9C'>，アクセス：2020/05/02。Satake, Tomohiko. 2019. “Nichigou doumei no kanousei” [Possibility of ‘Japan-Australia Alliance’]. (Accessed on May 2, 2020).

サトゥ・リマイエ，2017，〈日印と同盟・提携関係を結ぶアメリカ〉，堀本武功編，前掲，101-119。Limaye, Satu. 2017. “Nichinn to doumei teikei

kankei wo musubu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that Concluded Alliance and Alignment with Japan and India]. In Takenori Horimoto, edit, Above, pp.101-119.

白石昌也，2014，《日本の「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外交：全体像の俯瞰》，東京：早稲田大学アジア太平洋研究センター。Iraisi, Masaya. 2014. *Nihon no senryakuteki pa-tona-shippu gaikou: zentaizou no fukan*[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Diplomacy: An Overview of the Big Picture]. Tokyo: Waseda University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関根仁博，2010，〈デリー・ムンバイ間産業大動脈構想〉，《日本貿易月報》，678: 15-17。Sekine, Yoshihiro, 2010.” Deli-monnbai kann sanngyou daidoumyaku kousou” [Delhi-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 Concept]. *Japan Foreign Trade Council(JFTC) Monthly Report*, 678: 15-17.

土山實男，2004，《安全保障の国際政治学》，東京：有斐閣。Tsuchiyama, Zitsuo. 2004. *Anzenhoshou no kokusai seizigaku*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Security]. Tokyo: Yuhikaku Publishing.

溜和敏，2017，〈核問題をめぐる対立から協力への回〉，堀本武功編，前掲，221-239。Tamari, Kazutoshi. 2017. “Kakumondai wo meguru tairitsu kara kyouryoku he no denkai” [Turn to cooperation on nuclear issues]. In Takenori Horimoto, edit, Above, pp. 221-239.

内閣官房，2013，〈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https://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nss-j.pdf>，アクセス：2019/05/07。Cabinet Secretariat. 2013. “Kokka anzenhoshou ni tsuite” [About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ccessed on May 7, 2019).

長尾賢，2017a，〈本当に「同盟」になり始めた日本とインドの関係〉，<https://business.nikkei.com/atcl/opinion/15/261283/101200011/?P=3>，アクセス：2020/05/29。Nagao, Satoru. 2017a. “Honntouni doumei ni narihazimeta nihonn to indo no kannkei” [Japan and India Really Started to form an 'Alliance']. (Accessed on June 20, 2020).

長尾賢，2017b，〈「一帯一路」に対抗する日・インドの戦略構想〉，

<https://business.nikkeibp.co.jp/atcl/opinion/15/261283/053100010/>，アクセス：2019/03/20。Nagao, Satoru. 2017b. “Ititaitiro ni taikou suru nichu Indo no senryaku kousou” [Japan-India’s Strategic Counter to OBOR Initiative]. (March 20, 2019).

日本経済新聞，2018a，〈日豪部隊地位協定、早期妥結を確認 中国にらみ「準同盟国」明確に〉，<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36317060Q8A011C1PP8000/>，アクセス：2020/05/28。Nihon Keizai shinbun. 2018a. “Nitigou butai chii kyoutei, souki dakyou wo kakuninn chuugoku nirami jundoumeikoku” [Japan-Australia Force Status Agreement Confirmed Early Completion Clarified ‘Quasi-alliance’ Targeting China]. (Accessed on May 28, 2020).

日本経済新聞，2018b，〈日米印、共同でインフラ投資 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で 資金力で中国に対抗〉，<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29154380Z00C18A4PP8000/>，アクセス：2019/06/06。Nihon Keizai shinbun. 2018b. “Nichibeiin kyoudou de infura toushi indotaiheiyou chiiki de shikinryoku de chuugoku ni taikou” [Japan, US, and India Jointly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Compete with China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with Financial Strength]. (Accessed on June 6, 2019).

伏見威蕃訳，ビル・エモット著，2008，《アジア三国志：中国・インド・日本の大戦略》，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Iwann Fushimi, trans. Bill Emmott. 2008. *Azia Sankokushi: Chuugoku Indo Nihon no Daisenryaku* [Rivals: 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 Tokyo: Nihon Keizai Shinbun Books.

堀本武功，2006，〈国際政治における南アジア：インド外交と印米関係〉，《アジア研究》，52 (2): 36-47。Horimoto, Takenori. 2006. “Kokusai seizi ni okeru minami azia: Indo gaikou to Inbei kankei” [South Asi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dian Diplomacy and India-US Relations]. *Asian Studies*, 52 (2): 36-47.

堀本武功，2009，〈変化するインド外交〉，《現代インド・フォーラム》，

1: 24-31。Horimoto, Takenori. 2009. “Henka suru Indo gaikou: taikoku gaikou wo susumeru no ka” [Changing Indian Diplomacy]. *Contemporary India Forum*, 1: 24-31.

堀本武功，2012，〈現代インド外交路線の検討——連携外交による大国指向——〉，近藤則夫主編，《現代インドの国際関係—メジャー・パワーへの模索》：37-68。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Horimoto, Takenori, 2012. “Genndai Indo gaikou rosen no kentou—renkei gaikou niyoru taikoku shikou” [Exa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India’s Diplomacy Routes: Great Power Orientation by Cooperative Diplomacy]. In Kondo Norio, ed., “*Gendai Indo no kokusai kankei: Mejya pawa-he no mosaku*” [*Contemporary Indi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earching for Major Power*], pp. 37-68. Tokyo: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堀本武功，2015，《インド 第三の大国へ》，東京：岩波書店。Horimoto, Takenori. 2015. *Indo: daisan no daikoku he* [*India: Toward the Third Great Power*]. Tokyo: Iwanami Shoten Publishing.

堀本武功，2017，〈南アジアのコンネクティビティをめぐる印中のせめぎ合い〉，《現代インド・フォーラム》，35: 3-10。Horimoto, Takenori. 2017. “Minami azia no konekuthibithi wo meguru Inchuu no semegiai” [India and China Vie for Connectivity in South Asia]. *Contemporary India Forum*, 35: 3-10.

フォーリン・プレスセンター，2019，〈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平和と繁栄をどう確保するか～〉，<https://fpcj.jp/useful/wjn/p=70245/>，アクセス：2019/03/07。Foreign Press Center. 2019. “Ziyuu de hirakareta indo taiheiyou ~ chiiki no heiwa to hanei wo dou kakuho suru ka ~”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How to Secure Regional Peace and Prosperity]. (Accessed on March 3, 2019).

防衛省・自衛隊，2018，《平成31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14ページ，<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20181218.pdf>，アクセス：2019/10/02。Boueishou/jieitai. 2018. “Heisei

31nendo ikou ni kakaru bouei keikaku no taikou”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 for FY 2019 and beyond December 18, 2018] (Accessed on October 2, 2019).

防衛省・自衛隊，2019，《防衛白書：日本の防衛》，356~361ページ，<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9/pdf/R01030301.pdf>，アクセス：2019/10/02。Boueishou/jieitai. 2019. “Bouei hakusho: Nihon no bouei” [Defense of Japan 2019]. (Accessed on October 2, 2019).

マドオチャンダ・ゴーシュ，2017，〈インド経済のダイナミズムと日印関係〉，堀本武功編，前掲，61-80。Ghosh, Madhuchanda. 2017. “Indo Keizai no dainamizumu to nichiiinn kankei” [India’s Economic Dynamism and India-Japan Relations]. In Takenori Horimoto, edit, Above, pp. 61-80. Tokyo.

三船恵美，2017，〈台頭する中国と日印関係〉，堀本武功編，前掲，121-142。Mibune, Emi. 2017. “Taitou shuru Chuugoku to Nichiinn kankei” [Rising China and Japan-India Relations]. In Takenori Horimoto, edit, Above, pp.121-142.

渡辺将人訳，ケント・E・カルダー著，2008，《日米同盟の静かなる危機》，東京：ウェッジ。Masahito Watanabe, trans. Kent E. Calder. 2008. *Nitibei doumei no sizukanaru kiki* [Pacific Alliance: U.S.-Japan Rel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okyo: Wedge Books.

ユーチューブ，2006，〈インドのシン首相の国会演説〉，<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bUv8Jyz3qo>，アクセス：2020/06/01。YouTube. 2006. “Inndo no shinn shushou no kokkai ennzetsu” [Parliamentary Speech by PM Shin of India]. (Accessed on June 1, 2020).